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32

2009年6月11日

\*\*\*\*\*

## 日本“改憲”及其戰略目的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特約研究員 黃曉京

2010年，《美日安保條約》簽訂50週年，日本將舉行一次全民“公投”。對此，知道的人不多，瞭解的人更少。面對“全球化”的複雜國際環境，日本正在靜悄悄的推動國家戰略轉型，核心內容叫“改憲”，這次“公投”是為了“改憲”。

二戰以後，美英和前蘇聯重新分割勢力範圍，美國成功地將日本改造成自己的附庸國。整個冷戰時代，日本“甘當老二”，追隨美國，一方面實現“經濟奇蹟”，一方面也揹負著戰敗國，甚至“美國殖民地”的陰暗心理。這種國家心理的不平衡，又集中體現在美國給日本制定的憲法上。被美國保護下的和平與繁榮，並沒有改變美日關係的深層矛盾。20世紀90年代起，日本經歷了一場持續十餘年的經濟衰退，中國以全新的姿態回歸世界舞臺，東亞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鉅大變化。美國的對華政策，既有以“美日同盟”遏制中

國的戰略選項，也有與中國做戰略協調的選項，日本無法迴避“美日同盟相對化”的危險，據說又面對著中國的“威脅”，從而提出重新塑造自己的國家戰略，通過“改憲”（修改憲法），特別是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條款，當“普通國家”。

同時，進入 21 世紀日本在經濟上已經高度依賴中國和亞洲市場。這個新興的經濟重心區，逐漸超過歐美，成為日本這個“貿易大國”的“生命線”。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這對於“貿易立國”的日本來說非同小可。經濟學家們預測，再過 20~30 年，亞洲地區的 GDP 將佔到世界的 50% 以上，與美國、歐洲並列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不少日本企業開始或者正在調整偏重歐美市場的經營體系，轉而經營東亞，投入更多的財力、物力、人力，構造與美、歐、日並列的“第四極”。亞洲各國，特別是在華人文化圈和伊斯蘭文化圈，在相近的文化背景之下，形成某種不同與其他地區的，更重視人際關係的所謂“網絡體系”，多少使這個亞洲的“西方國家”和它露骨的“親美”政策，使日本被孤立，被疏遠，甚至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被歐美和亞洲兩方面排斥出局。因此，日本政界，經濟界和學界，提出“親美入亞”的口號，一方面維持與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同盟關係，一方面從“脫亞”轉為“入亞”，回歸亞洲、這是一個故意模糊，具有雙重性的中庸的國家戰略。

在“親美”和“入亞”的雙重戰略目標之下，日本“改憲”的實施和結果也十分複雜。其一，如以強化美日同盟為目標，則“改憲”之後無非以“集體防衛”為依據，繼續作美國的隨從，作美國東亞戰略的基地，對抗中國崛起的威脅。其二，如以建立與依賴亞洲經濟相適應的安全體系為目標，主動放縱“美日同盟相對化”，同時在自主防衛的概念之下，製造與中國，亞洲各國作“安保合作”的可能。其三，則是一石兩鳥，二者兼備，經過一個過渡期，繼續加強日本獨自的軍事實力，最終可能是既“疏美”又“抗

中”，甚至再次稱霸亞洲。日本朝野顯然在此三者之間徘徊不定，“改憲”的理論與現實矛盾重重。以日本人及其國家的性格來看，最大的可能就是在“親美”不變的條件下“入亞”，在“親美入亞”的口號下尋找自己的獨立的國家發展戰略，既第一目標和第二目標的混合物。第三目標的選擇，取決於中美關係的發展。最近，所謂“制服組”，即軍事單位發表的對於國家戰略的意見，如日本防衛省（國防部）研究所《防衛戰略研究會報告書》（2008年2月），《亞洲戰略概觀2008》（2008年3月），《亞洲戰略概觀2009》（2009年3月），<sup>1</sup>以及軍人否定“侵略戰爭”的昏話，似乎反映出軍人勢力的復興趨勢。

## 一、日本“改憲”的源由和雙重戰略目的

2007年5月3日，日本戰後憲法（1947年5月3日實施）60歲。從1889年“明治憲法”開始實施算起，日本的“憲政體制”百歲有餘，為亞洲之最。戰後的日本憲法，以象徵的“天皇制”和“主權在民”為基礎，以放棄國家主權之一的交戰權（即憲法第九條）為主要特徵，給日本帶來60年的和平環境，為日本創造經濟奇蹟提供了條件。日本憲法共103條，分為前言、天皇、國民的權利和義務等11章。第九條最受人們關注，內容是：“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作為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此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此即所謂“和平條款”。這部由美國主持制定的日本憲法，閹割日本的國家主權，當時的日本一敗塗地，只有臥薪嚐膽，被動接受。時過境遷，現在的日本朝野對於這部憲法的態度就像面對一

---

<sup>1</sup> 三刊物詳見日本防衛研究所網站（<http://www.nids.go.jp/>）。

個行將退休的老人，一邊說過去如何如何有功勞，一邊也在或明或暗地表示您該下崗了。

筆者在關於日本國家戰略的討論中指出，<sup>2</sup> 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有兩條交錯的思想路線，一曰富國，二曰強兵，前者是效法西方資本主義，實現經濟近代化，後者效法西方的殖民主義，侵伐霸道。戰爭崛起，依產業發展助戰，戰爭促進產業發展，故“富國強兵”，“強兵富國”，二者互為表裡，相輔而用，從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直至二戰慘敗。在保持天皇制國體的條件下，日本接受美國改革，接受和平憲法，在《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之下確定了“富國不強兵”的經濟立國路線。我這裡略去了對於憲政體制的討論，其實無論戰前戰後，無論“強兵富國”，還是只“富國不強兵”，都是在日本憲政體制“外衣”之下實施的。

說憲政是“外衣”非筆者的發明，自有日本學者議論在先。明治時代日本人將英文 Constitution 一詞，譯為漢字的“憲法”，政治學者高阪正堯說這是個“拙譯”，作家司馬遼太郎也說，“國形”（國家形式、型式、樣式）一詞可能更符合這個詞的原意。李鴻章當年走訪列強，著大清國服，長袍馬褂，1871年12月，岩倉具視使節團“五大臣”遍訪歐美，只有岩倉一個人穿和服留武士髮型，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皆西裝短髮。1872年10月12日，英國的新聞刊登出岩倉在美國周遊之後“洋裝斷髮”的照片，是一個極具象徵性的事件。西方的立憲政治，就是所謂“民族國家”的外衣，日本改著“洋裝”，同時開始拋棄“中華正統”。1872年，日本改傳統的中國陰曆為西曆，1989年正式實施憲政體制。和岩倉的變化一樣，日本憲政首先是效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日本自己換衣服，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教育一體“包

---

<sup>2</sup> 黃曉京：〈日本的“國家戰略”——美日同盟和中國的戰略應對〉，《香港傳真》No.2006~6。

裝”。於是，日本成為非西方的最早的近代國民國家，其歷史連同這些日譯漢字新詞彙一起寫進了亞洲的近代史。新一代日本人早就忘了他們的祖先曾效中國典章，干支記年，而歐美則視日本為最好的學生。

這是日本史上最大的一次轉型。上千年來，日本一直穿著中國漢唐文化的“外衣”，其“國形”也幾乎“全盤中化”。明治20年（1888年），日本行所謂“脫亞入歐”，擺脫中國世界的“華夷秩序”，不到十年（1894年），日本已有效法西方，侵伐霸道的實力，從朝鮮問題切入，挑起甲午戰爭。當時的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他的《蹇蹇錄》（取自《易經》，蹇蹇匪躬）中，曾將此戰定義為“西歐的新文明與東亞舊文明的衝突”，比時下的文明衝突論早了一百年。他和伊藤博文一起，以所謂“國際慣例”，拒絕了李鴻章的議和條件，以及東亞兩大國同文同種，當親睦合作，勿為西方白人得漁人之利等等廢話，最終迫使李鴻章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此書為實錄，描述了李鴻章的嘆息，一曰自己才短，不及伊藤博文成就維新，二曰此戰顯示日本以歐洲流陸海軍力戰勝，謂東方人不亞於西方，三曰此戰可警醒中國人的迷夢，有助於將來云云，讀來令人扼腕！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

日本近代，戰爭崛起。二戰大敗，“一億人總懺悔”，懺悔的不是侵略中國和亞洲弱國，而在於誤認強國，與德意聯盟，以英美為敵。戰後，日本第一個出生高峰期在1947~1949年間，那個時代出生的日本人被叫做“團塊世代”。這個概念來源於礦物學上 nodule 一詞，作家堺屋太一寫了一本同名暢銷書，使它成了流行話語。這一代人大約有680萬，他們在日本社會變革期長大，既吃過戰後貧困的苦頭，又是1985~1991年日本經濟高峰期的企業中堅；他們既承續了日本傳統價值，又喜歡歐美的生活方式；

既享受年功序列、終身僱用的既得利益，又是“過勞死”或者“泡沫經濟”崩潰後自殺的悲劇主角；既是自由主義者，又大都參與過學運工運，不少人反體制甚至反美。小泉和安倍都不是這一代，小泉生在戰時，安倍生在戰後 1955 年，當“團塊們”為《美日安保條約》在前首相岸信介家門口抗議集會時，安倍還是騎在他外祖父岸信介背上的孩子。2007~2010 年“團塊們”將會退休，把他們的矛盾移交給了下一代，而戰後憲法是這矛盾的核心部分，團塊們也曾經為“護憲”和“改憲”而爭吵不休。

憲政是高居於一切政黨政治之上的國家體制，其自身具有某種強制的性格，與“民主主義”政治有某種緊張關係，此乃立憲國體的題內應有之意。“護憲”和“改憲”之爭，反映的是對於國家體制和未來定位的不同，事關國家利益的本質，人權和民主反而成了表象。2007 年 5 月 3 日，日本戰後憲法的生日。安倍前首相有一番談話，大意是說戰後憲法體現了主權在民，即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尊重人權的原則，對日本貢獻鉅大。但是在全球化的新時代，以憲法為頂點的日本國家體制，以及政治外交和安全保障到了要改造的時候，他強烈期待國民廣泛議論，指出方向。隨後，日本議會制定了《修改憲法國民投票法案》，法案規定，三年之後（2010 年）將通過國民投票完成“改憲”手續，也就是日本的“國投改憲”，主要內容是修改第九條“放棄戰爭”條款。

這個條款是戰後美國和日本的一個交易。老牌政治家吉田茂，為維護“天皇國體”，容忍美國解除日本武裝，接受放棄戰爭，不保持軍隊的憲法第九條。中曾根康弘瞭解那段歷史，用他的話說，主權國家哪兒有沒軍隊的？吉田茂是先接下來再說。沒軍隊嗎？吉田在 1951 年《舊金山和約》之後和美國搞《安保條約》，無限期地允許美國駐軍，由美國保護。在反對“共產主義擴張”威脅的問題上，美國和日本找到了利益共同點。據說羅斯福總統是相信斯大林的，假如他不是過早死去，那麼蘇軍可能進駐日本，和朝鮮半島

一樣，日本列島可能來個東西方對峙。歷史事實是，美國主導了日本的改造，排除蘇聯勢力，鎮壓了日本國內的共產主義和其他反抗勢力，在東西方冷戰，特別是朝鮮戰爭以後，確立日本的“保守體制”（即所謂“1955年體制”），成為遠東的反共基地。1960年，岸信介內閣和美國修訂《安保條約》，續約十年，為緩和國內反抗，增加了美國駐軍在裝備配置等問題上和日本通氣，以及美日共同防衛的條件。“團塊世代”參加過1960~1970年代的“安保運動”，罷課遊行，上街示威，警民衝突死了人，他們反對的是美國駐軍的長期化，要求廢除《安保條約》。岸信介企圖通過修改《安保條約》和美國對等，示好於民，然後“改憲”，結果適得其反，他自己下臺不說，以後的幾屆內閣再不提“改憲”。美國搞它的美蘇冷戰，日本全心全意搞經濟掙錢，各取所需，皆大歡喜。“團塊”和“後團塊”的日本逐漸遠離政治，一流進公司，二流當官僚，三流搞政治，“改憲”與“護憲”的問題，成了純粹的紙上談兵。

這以後，日本習慣了追隨美國，習慣了當“經濟動物”。1980年代中後期，美國和日本的貿易摩擦昇級，美國大談“日本威脅”，其實主要是經濟，尤其是美國製造業失敗所造成。為了將其在製造業和貿易上的失利，轉為勝利，美國搞1985年的“廣場協議”，逼日本解除管制，金融自由化，結果使日元升值，泡沫經濟和後來的全面衰退。1990年爆發的海灣戰爭，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聯合國決議派兵，美國為首，日本則“主流護憲”。海部俊樹內閣（1989~1991年），小澤一郎當自民黨幹事長，他們在國會提出了《國聯和平協力法案》，沒有通過，不能派兵，只出錢（130億美元助戰）不流血。美國接受了，可是戰後科威特發表感謝聲明，挨個道謝，就是沒有出錢最多的日本。日後，此事被經常提起，成了日本提出“改憲”的一個契機。1994年，北朝鮮試驗導彈，美國前總統卡特訪朝談判；1995年，李登輝搞臺獨，兩岸關係緊張，“亞洲有事”論成了時髦話題，加快了日本“改憲”步伐。9.11之後，

美國先後發動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小泉內閣（2001~2006年）制定了《反恐臨時措置法》，出兵伊拉克和印度洋，說是非戰鬥地區，後方支援，實質上為了美軍主戰，既是事實違憲，也製造了“解釋改憲”的前例，日本也因此進了本·拉登黑名單，每天戒備恐怖襲擊，東京的地鐵車站都佈滿了荷槍實彈的警察。

安倍內閣繼小泉內閣與美國“接軌”改革之後，直奔“改憲”主題。在他短暫的任期內（2006~2007年），唯一做成的事就是那個《修改憲法國民投票法案》。如果將小泉和安倍兩個內閣的政策聯繫起來看，小泉是“接軌”，安倍是“改憲”，二者在施政原則上“親美一邊倒”，繼承了日本追隨強者的優良傳統。安倍上臺沒有按慣例速訪美國，那時因為急於顯示與前任的不同。首次外訪來中國，那是國內外改善對華關係呼聲甚高所致。他的基本施政是“改憲為綱，綱舉目張”，故而不惜誇大朝鮮半島威脅，海峽兩岸危機。小泉和安倍是連續操作，“接軌”之後，美日軍事同盟“全球化”，符合美國的戰略需要，“改憲”則將此種“集體防衛”法制化。反對黨領袖的小澤一郎，政治思維是改變日本的美國“一邊倒”政策，主張“日美中等距離外交”，繼承了田中角榮以來對華政策和人脈，把強化與中國的戰略合作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福田內閣（2007~2008年）在這一點和小澤民主黨一致，差一點搞成自民和民主兩黨的聯合執政。日本社會的看法則十分複雜矛盾，2007年8月15日，NHK的民意調查，47%贊成“改憲”，“25%”左右贊成護憲，關於第九條放棄戰爭條款，則有41%的國民反對修改，反映了這種複雜矛盾的社會心理。公共知識分子有不少是“護憲派”，梅原猛、大江健三郎、奧平康弘、小田實、加藤周一、澤地久枝、鶴見俊輔等組成“九條會”，堅守維護“和平憲法”。

當今時代，美國一家獨大，“新帝國主義”和民族國家利益衝突，而多元體系，尚在摸索之中。在這個世界體系之下，各國、各地區，能否保護自身利益，不單取決於經濟實力，主要取決於政治



和軍事實力，兩者互為因果。日本一個島國，從石油、各種工業原料、到糧食，樣樣依賴進口，不論是石油安全還是糧食安全，都要靠美國的保護。布什政權的反恐戰爭失敗，歐盟、伊斯蘭世界、大中華圈和亞洲各國都在研究“反恐後”時代，即美國勢力日益衰落，多元世界體系的構築問題。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追隨美國”的日本必將孤立，還要警惕美國的“越頂外交”——與中國合作的選項。日本經濟界從這個角度支持“改憲”，要求明確保持軍力和戰力，在嚴酷的國際環境下保護日本的經濟利益，同時改善與中國的關係。<sup>3</sup> 日本是美國在東亞的盟國，可是在華盛頓的政治家、戰略家那裡，畢竟處在一個棋子的位置而已，與中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符合日本的利益。“親美入亞”，即在維持美日同盟體系的同時，推進與中國及亞洲各國的戰略合作關係，在今後一個歷史時期將是日本內外政策的重點。

毫無疑問，日本的這個戰略轉型一改戰後格局，困難重重。“跳樑”很可能成為“小丑”，承受來自美國和中國兩方面的不信任。近代日本，曾經使西方和美國感受過東方的威脅。1905年，日本以一亞洲小國打贏“日俄戰爭”，從大清帝國拿到了南滿鐵路和沿線的經營權。通過 9.18 軍事行動，在中國東北建立殖民地“滿洲國”，加入殖民帝國主義“文明列強”。1929~1931年，全世界資本主義大危機時代，日本經濟凋敝，通過掠奪中國東北和蒙古的自然資源，擺脫危機，確實事關重大。松崗洋佑稱“滿洲”為“日本的生命線”，絕非戲言。對於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文裝武備”（滿鐵總裁後藤新平語），英美無法容忍，高調要求日本交還主權給中國，而日本則不惜退出英美主導的國際聯盟，從此埋下最終與英美作戰的遠因。日本右翼思想的代表之一大川周明，有一部《美英東

---

<sup>3</sup> 經濟同友會憲法問題調查會：《憲法問題調查會意見書》，2003年4月（<http://www.doyukai.or.jp/database/teigen/030421.pdf>）。

亞侵略論》，認為從鴉片戰爭算起，美英要將亞洲殖民地化，日本必須領導亞洲加以反抗。此人繼承了明治維新時代的“尊皇攘夷”思想，對中國的侵略成了對抗西方的自衛，以“興亞”為名行侵伐霸道之實，靖國神社“遊就館”展示的就是這種歷史觀。戰後冷戰，意識形態壓倒民族國家；冷戰之後，世界格局復歸 19 世紀末期。“文明衝突”還是“文明合作”，天下國家，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在這個變革時代，中國回到世界舞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基辛格說，“這是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一邊是貫徹“新帝國主義”的美國，一邊是艱難改革、崛起有望的中國，日本夾在中間。何去何從，日本長考，舉棋不定，最後確定“改憲”佈局，具有對付美國和中國的雙重戰略目的。

## 二、“改憲”與美日同盟的深層問題

從明治維新到戰敗、日本按照西方模式自我改造，明治憲法，效法德國，戰後憲法，仿效美國。美國式的“日本改造”，包括土地改革，解散財閥，實現民主化，“三大改革”。而民主化的核心，就是美式憲政。日本人把“和平憲法”叫做“麥克阿瑟憲法”，說它是美國強制“改造日本”的象徵。部分“左翼”持不同看法，認為和平憲法，符合日本的核心價值，而非美國強迫。太平洋戰爭，是美國東方戰略的延伸和最終實現，美國在軍事上壓倒日本，給“黑船來襲”之後美日關係的曲曲折折劃上了一個句號。面對原子彈，瘋狂的日本軍人還在叫嚷“一億人玉碎”，昭和天皇（1901~1989年）則要保存這個民族，保存萬世一系的“皇統”。就是這個天皇，頒佈詔書，宣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

1945年8月6日，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關於是否使用原子彈結束戰爭，杜魯門和丘吉爾說法不同。杜魯門說，原子彈作為

一種武器，使用還是不使用，根本就不是問題，丘吉爾也贊成使用。丘吉爾本人則說，從來沒有說過贊成使用原子彈。美國認為那是“戰爭正義”，說是“我們花了 20 億美元。廣島投下的原子彈，使戰爭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人類進入核武時代，斯大林招來五位物理學家，要求不惜一切代價開發核武器，開始了美蘇的“核競賽”。1945 年 8 月 7 日，蘇聯廢棄《蘇日互不侵犯條約》，對日宣戰，8 月 9 日出兵中國東北，日本至今對蘇聯的“違約”不能原諒。8 月 9 日，鈴木貫太郎首相召開內閣會議，當時的外相主張，以保持天皇制度為唯一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陸軍大臣則提出四項條件，包括保留天皇制、日本自己對戰犯進行裁判、自己放下武器、避免聯合國軍佔領。少壯軍人則在策劃政變，企圖再建軍人政權。閣議之中，美國的第二顆原子彈扔到了長崎，深夜召開所謂“御前會議”，由天皇裁決。天皇以保存國家和民族生存為由，支持外相的意見，結束戰爭。8 月 10 日，日本外務省通過中立國瑞典和瑞士發出電報，在保證“天皇制”不變的條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中國和英國立即表示同意，美國內部則圍繞“天皇制”問題議論紛紛。8 月 12 日，美國通過舊金山電臺表示，日本的政治形態將由日本國民的意志所決定，天皇和日本政府的國家統治權將隸屬於（subject to）聯合國軍最高司令部。對此，日本內閣會議依然議而不決，8 月 14 日再次召開“御前會議”，天皇表示不能再戰，8 月 15 日，天皇發佈《終戰詔書》。在這份“投降書”公佈前夜，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剖腹自殺，他的兒子就是剛剛卸任不久的前駐華大使。中國人不忘 9.18、南京大屠殺；日本人不忘 8.15、廣島長崎。

“星條旗下署降箋，知彼深謀已百年”。<sup>4</sup> 1945 年 9 月 27 日，“亡國之君”天皇裕仁，走出皇宮，到聯合國軍司令部（GHQ）

---

<sup>4</sup> 木下彪：《日本戰後的史詩》，老古文化事業公司 1986 年，第 21 頁。

面會麥克阿瑟將軍。根據美日兩方的紀錄，昭和天皇談話大意是，“這場戰爭我負一切責任，請不要追究戰犯，要處刑也請只限我一個人，國民沒有責任，希望提供糧食”。麥克阿瑟問，“為什麼不能阻止戰爭？”天皇答曰，“如果我制止，他們會找另外一個天皇，那是國民的意志”。1945年10月2日，麥克阿瑟的軍事秘書在“備忘錄”中寫到，“如果追究天皇的戰爭犯罪，大規模暴動不可避免，佔領期間將會長期化，我們將失去日本人的信賴”。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發表關於《新日本建設詔書》，即所謂“人間宣言”，重申明治天皇的《五條誓文》，承認天皇不是“現世神”，日本民族優越只是“架空的觀念”。1946年1月4日，美國的政治顧問在寫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中說，“我相信，天皇是戰爭罪犯，但是，為了統治日本我們不能不利用天皇”。

1946年2月4日，GHQ民政局長惠特尼召開會議，他說，日本政府的憲法草案你們都在新聞上看到了，與“明治憲法”沒什麼區別，日本人不知道什麼叫民主主義，今後一個星期，民政局負責做成日本憲法。美國佔領當局，就這樣開始了為日本“立憲”。麥克阿瑟提出了三項原則，第一、天皇為日本國家元首，第二、廢止發動戰爭的國家權力，第三、廢除日本的封建制度。1946年2月13日，惠特尼會見外相吉田茂，國務大臣松本蒸治，參事白洲次郎。松本兼任“憲法問題調查委員會”的委員長，就是他向GHQ提出了《憲法改正要綱》。惠特尼開門見山地說，你們提出的《憲法改正要綱》完全不能接受。美國人帶來新的《日本憲法草案》，其中寫道，“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是日本人民統合的象徵”。日本人的草案則沿襲明治憲法，保留天皇主權的條款。戰爭中深受迫害的學者美濃部、津田左右吉，主張維護“明治憲法”，反對“改憲”。其理由是，所謂“民主主義”有其非常危險的一面，希特勒就是在主權在民的名義下實行獨裁專制，“法西斯主義”和“民主

主義”是學生兄弟。當然，這種議論無法改變美國“民主化”日本的既定政策。1946年3月4~5日，憲法的逐條審議和英譯完成，3月6日政府發表了憲法改正草案大綱，同時天皇發表敕語，以“放棄戰爭”和“尊重人權”為原則憲法得以改正，<sup>5</sup> 期望政府必能達到此目的云云。日本全面接受了“麥克憲法”，建立了“傳統權威（皇權）”和“國家權力（政權）”分離，“皇權”與“民權”並存的憲政體制。

為了程序合法性，“麥克憲法”經過了國會審議。美國的“草案”，改名為“內閣憲法草案”，1946年4月17日公佈。5月22日，第一次吉田內閣成立。1946年6月，在憲法審議會會議上，從延安歸來的共產黨議員野阪參三，對“放棄戰爭”第九條提出質疑。他用“正義的自衛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概念，要求改寫為放棄“侵略戰爭”。吉田茂回答說，“近年的戰爭，皆以國家防衛權為名而發生，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您的意見我認為是有害無益的議論”。吉田知道，為保護天皇制，只能完全放棄“交戰權”，以取得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的諒解。同時，吉田已經有了與美國建立軍事同盟的腹案。最終在“放棄戰爭”一條，加了一個限制詞，即“永遠放棄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武力行使”，給國防自衛留下了空間。在審議“麥克憲法”的整個過程中，松本蒸治一直沒有露面。直到1954年7月，自民黨召開的“憲法調查會”上，他才證明說，1946年2月惠特尼威脅說，“沒有放棄戰爭這一條，無法保障你們天皇的生命安全”。這一證詞也成為現在新的“改憲”論者，關於美國“強制制憲”的重要證據。反過來也證明，美國急於以維持天皇制為條件，徹底解除日本武裝的決心。新憲法公佈之後，1946年5月19日，日本發生了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運動。度過18年監獄

---

<sup>5</sup> 有馬學：《帝國的昭和》，講談社2002年。

生活的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德田球一，在皇宮前的廣場發表演說，要求廢除天皇制，美國轉而持鎮壓態度。1946年5月20日，麥克阿瑟要求“少數不逞之徒”自制，否則將採取非常手段。美國政府認為，和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樣，日本的社會主義也是蘇聯在背後操縱的結果。同年，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丘吉爾發表著名的“東西方鐵幕”的演說，“杜魯門主義”登臺，形成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兩大陣營”的世界格局。

1947年5月3日，實行新憲法（同是戰敗國的德國憲法，則由德國聯邦議會自行制定，由佔領三國軍事長官批准於1949年5月23日實施），日本又一次“換衣裳”，明確地加入“兩大陣營”的“自由民主”一方，一部美國制定的憲法可真是法力無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朝鮮戰爭爆發，東西方冷戰開始，更加凸現了美國“改造日本”的戰略意義。日本重新解釋“麥克憲法”，吉田茂強調，“憲法第九條”並沒有放棄自衛權。1950年5月，美日開始了關於防衛的秘密會談，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7月麥克阿瑟指示日本建立7500人的“警察預備隊”，1951年又要求日本再建自衛隊，為美軍提供後方支援，在不為人知的背後承擔了朝鮮戰爭的重要角色。1951年8月《美日安保條約》簽訂，1952年4月28日生效。該條約由前言和三條正文組成。主要內容有：日本承認美國在日本駐紮陸、海、空軍；駐日美軍為維護遠東和平與安全和保障日本的安全，應日本政府的請求，可用武力鎮壓內亂和暴動，以及對付外來的武力攻擊；美軍駐紮日本的條件照日美兩國間的行政協定規定。此條約不僅構成規定日本從屬美國的法律依據，而且使美國可以在日本幾乎無限制地設立、擴大和使用軍事基地。其後，日美為加強兩國間的軍事同盟，從1958年起，就修改條約問題進行談判，並於1960年簽訂《新安保條約》。新條約與舊條約相比，在實質上沒有多大

變化，只刪去舊條約中關於美軍幫助日本政府鎮壓內亂和暴動等條款。規定遇有武力攻擊日本以及日本國內的美軍基地時，日美雙方應共同對付並採取行動等。新條約有效期為十年。1970 年到期之後，日本政府通知美國政府，宣佈自動延長。從軍事基地、資金、裝備技術等各方面，為美國的東亞戰略提供條件。作為一個現實主義政治家，吉田茂十分清楚，戰後世界的領導是美國，並迅速地將日本的命運和美國捆綁在一起。1954 年 12 月，吉田內閣辭職，鳩山一郎內閣曾試圖修正對美國的“一邊倒”政策，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並主張建立與美國對等的相互防衛條約，但在冷戰時代這只能是幻想而已。《美日安保條約》沒有關於核武器配置的規定。1949 年，蘇聯成功開發原子彈，美國則開始試驗氫彈，日本漁民受到放射性塵埃傷害，160 萬人遊行抗議，遭到政府的鎮壓。1957 年，岸信介內閣與美國經過秘密協議，以事先通知為條件，允許美國在日本基地裝備核彈頭。1972 年，美國的航空母艦“中途島”號進駐橫須賀，此艦 1945 年起服役，具有核攻擊能力，參加過從越南戰爭到海灣戰爭的一系列戰爭。此後，“獨立號”、“小鷹號”進駐日本基地。

日本的“1955 年體制”，保守派實現了“美日安保”大聯合，抑制了國內的反對勢力。同時，“富國不強兵”的經濟政策，創造了高速的經濟成長，也創造了一種“遠離政治”的社會氣氛。“改憲”與“護憲”，只是一個政黨政治的課題，主要是一些政治人物鏗而不舍。比如中曾根康弘，從 1952 年美國佔領期結束，日本“獨立”開始，作為政治家，他自認的使命就是“改憲”，對此“團塊世代”早就失去了興趣。1983 年，中曾根當了內閣總理，終於實現了軍事預算超過 GNP 的 1%。各國輿論開始大談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大談日本“軍事大國”。1983 年 5 月 3 日，83 歲的岸信介出席“自主憲法改定國民大會”。1987 年，他抱著“自主憲

法”的夢想離世。中曾根之後的歷屆內閣，主要精力用於對付日美貿易摩擦，“改憲”問題被長期擱置。

1992年，日本參與“聯合國維和”，通過了“PKO法案”，自衛隊可以“海外派遣”參加維和。冷戰結束之後，日本社會黨改變“社會主義”路線，成了實質上的社會民主黨，降下了“護憲”的旗幟，國內反對勢力減弱。1996年4月，橋本龍太郎首相和克林頓總統簽署《美日安保共同宣言》，原來對付蘇聯的同盟，變成對付“亞洲有事”，周邊事態，美日同盟關係得到強化。五年之後9.11事件，小泉內閣完成了與憲法第九條衝突的一系列“特別立法”，為“改憲”提供了一個新的“判例”。安倍政權把“改憲”推入實施階段。民主黨小澤一郎則強調日、美、中等距離外交，把中國和美國同等的地位，其實他也是“改憲”論者，在等距離外交基礎上的“改憲”。他公開批評美國的伊拉克的戰爭，因此使美國政界對他開始警惕起來。2007年夏天，參議院選舉，安倍自民黨大敗，小澤民主黨大勝，支配參議院，但“改憲”依舊是今後一個時期日本政治的一個主題，即使民主黨上臺執政也不會改變。

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美軍“合法”地存在於日本，基地遍佈，磨擦也就無法避免。日本有32個美軍基地，其中陸軍基地15個、海軍基地14個、空軍基地三個。沖繩是亞太戰略要衝，美國在那裡建立起最大的軍事基地。1972年5月15日，佐藤榮作內閣以保留基地、撤出核武為條件，從美國手中贖回了沖繩的“統治權”，美國不僅將沖繩統治權，還將釣魚島一起歸還日本，為以後中日關係留下一個障礙。2007年，日本收回沖繩35週年，名曰“收回”，實際上美軍基地佔地233平方公里，基地36處，佔沖繩本島總面積的18%，集中了駐日美軍75%的軍事設施和60%以上的軍事人員，總兵力近三萬人。<sup>6</sup> 沖繩西南的嘉手納空軍基地，是美

---

<sup>6</sup> 防衛廳編：《日本的防衛 — 防衛白皮書》2007年，第334~337頁。



軍空中力量中樞之一，距臺灣僅 640 公里，與上海、北京的距離分別為 860 和兩千公里。美空五軍第 18 航空聯隊駐紮，有 48 架 F-15 型戰機，以及各種偵察機、預警機和空中加油機。戰鬥機不用兩小時就可以到達朝鮮半島，一小時內可到達臺灣海峽。這裡還是美軍前沿偵察基地，多種電子偵察機經常從嘉手納機場昇空，執行偵察任務，貼近中國領海線飛行時，最近點距中國領海線僅 12 公里。幾年前，與中國軍機相撞的肇事 EP-3 美國偵察機，就從嘉手納基地起飛。基地內設施齊全，有兵營、通信設施、居民區、高爾夫球場、電影院和學校等，當地人稱為“小美國城”。近年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力量不斷更新，空五軍和空 13 軍司令部設在日本橫田，海軍第七艦隊主力駐橫須賀，那裡是“華盛頓”號核動力航母的母港，兩者互相呼應，構成西太平洋海空第一道防線。

沖繩是美軍基地，也是一個戰場。從越南戰爭起，美國在亞洲地區挑起的戰爭，都利用這個基地。近年來，美國空軍基地周圍老百姓不斷抗議噪音污染，飛機常常不分白天黑夜地起降，攪得居民無法生活。美國士兵還不時騷擾良家婦女，過去十幾年強姦事件上百起。1995 年，幾名美國士兵輪姦一名 12 歲少女，2000 年，一名美國士兵強姦一名 14 歲的日本女孩，引起當地民衆大規模的騷亂，沖繩海軍基地被迫實施宵禁。最近一次是 2008 年 2 月 11 日，美國士兵再次強姦一名 14 歲少女，沖繩的婦女協會寫信給布什總統，要求他撤銷基地。根據《駐日美軍地位協議》，美國駐日司令官無須向日本當局移交有關犯罪嫌疑人，美軍享受治外法權，更激起了沖繩人的憤慨，反美情緒高漲，要求美軍撤走。對此，在野的民主黨提出“有事駐留論”，即美軍基地撤出沖繩，只在“有事”的時候駐留，引起美國的強烈不滿。<sup>7</sup> 美國期待無論日本政局如何變化，美日同盟關係不變，沖繩駐軍依舊賴在那

---

<sup>7</sup>〈美國駐日大使西法爾的離任談話〉（日本《日本經濟新聞》2009 年 1 月 10 日）。

裡。奧巴馬上臺之後，國務卿希拉里首訪赴日，再次強調“美日關係是美國在世界上最主要的雙邊關係”，美日可能就八千名美軍撤出沖繩達成協議。為此，日本要負擔一百億美元搬遷費，而沖繩基地的矛盾也不會就此結束。

布什當政的八年，被稱作美日關係的“黃金時代”。2006年6月，美日簽署《新世紀的美日關係》，被稱為“歷史性”和“劃時代”的文件。“劃時代”的意思，一是，如果日本周邊地區發生“緊急事態”，美國和日本將在軍事上合作應對；二是，世界範圍的安全保障，美國可以得到日本軍事上的支援。日本政府號稱“保有集體防衛權，但不行使集體防衛”，實際上美日關係已經無疑是一種集體防衛。美日兩國開始使用“世界之中的美日同盟”概念，並且進一步充實了其在地區性和全球性軍事合作的內容。如果說美國這個“世界警察”是“包裝”成警察的強盜，那麼日本就是“全球從犯”。美國想用日本這個聽話的學生，對付不聽話的中國，也許還有俄羅斯。

2007年2月，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主持完成《美日同盟：正確引導亞洲2020》的報告（“第二次阿米蒂奇報告”，第一次報告於2002年10月發表），主張成熟的美日同盟關係是世界安全保障的基軸，表示支持日本“改憲”。這份報告預測，中國將崛起為“主導性地域大國”，從而使東亞秩序呈現三種可能性。第一、美國和中國共同霸權（Condominium），儘管美國一極將決定世界秩序，但是東亞的地區秩序將於美國和中國協調決定。第二、美國和中國的兩極化格局，美日同盟為一極，中國為一極，相互對抗。第三、在美國領導下，建立日本、印度、澳洲、新加坡等參與的地域秩序，在這種格局下調整與中國的關係。結論是爭取第三種可能性。報告還指出，美日同盟的“傳統概念”主要是中國、朝鮮半島，而“非傳統概念”則包括能源、氣候、恐怖主義、貧困、疾病諸多領域。關於地區經濟政策，美國主張建

立“泛亞太自由貿易區”或機構，日本則迴避這個議題，只回應美日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日本擔心美國主導亞洲體系，很容易被理解為帶有與沒有美國參加的 10+3 東亞經濟體系相對抗的意味。

對於美日軍事同盟的擴大，布熱津斯基有不同看法。他在《大棋局》中指出：“同日本保持密切的政治關係符合美國的全球地緣戰略利益，但讓日本走上重新武裝的道路，將會導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作用壽終正寢，並將排除美、日、中在地區內穩定的三角安排出現的可能性”。他認為支持擴大日本軍事的範圍和規模是不可取的。美國壓迫日本承擔更大的軍事作用，只能損害地區穩定的前景，阻礙在更廣泛的區域範圍同中國達成妥協，並因此使得在整個歐亞大陸推進穩定的地緣政治多元化的努力變得更加複雜。他提醒美國政府，“在以向中國舉足輕重的地位挑戰為目標的任何地區性安排中，不是主要依靠日本作為美國的軍事同盟國發揮作用”。的確，在東亞歷史上，日本“強兵”往往挑戰既有的東亞國際秩序，1894 年的甲午戰爭、1905 年的日俄戰爭、1937 年之後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無不如此。日本戰爭崛起路線，美國政府或是支持或是默許，直到爆發太平洋戰爭。現在美國的對日政策，又顯得過分自信，一部分人比如基辛格，認為在 5~10 年之內，可以容忍日本擁有核武器。日本正在重新啟動鈾處理工廠，這個工廠據說每年可以分離、儲存八公噸鈾，足夠製造一千枚原子彈。如果該處理工廠投入運營，到 2020 年，日本國內的鈾儲量將與美國武器級鈾的儲量相當。如此龐大的核原料儲備，不可能僅僅是為了發電。《通產省和日本奇蹟》的作者社會學者詹森也指出，美國扶持日本遏制中國的政策是一個危險的遊戲，難以在中日矛盾中獨善其身，如果中日發生衝突，美國無法躲開。不過，美國或許根本就不想躲開，除非中國接受美國的領導，或者找到另外一種協調關係。

### 三、“改憲”：“入常”和“強兵”

美日之間存在著利益衝突，並非鐵板一塊，比如對付北朝鮮“核威脅”的政策，兩國的政策差異表現的尤為明顯。對中國的政策，也存在這種差異。日本十分警惕美國的“越頂外交”，警惕美國的另外一種選項，即與中國來一個“共同霸權”。美國和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時刻挑戰日本的神經。日本的加速強軍，比如購買美國的“宙斯盾”系統，急切地完善其導彈防禦體系，都表現出這種神經不安。

防衛省的《東亞戰略概觀 2008》序章認為，美、中、日之間是一種“協調”和“牽制”並存的三國關係。對美國來說，只要中國不對其“單邊主義”的全球戰略提出挑戰，美國可以與中國合作，創造東亞地區某種穩定的環境。對日本而言卻絕非如此。中國的崛起註定會危及日本在這個地區的利益，日本不願意在與中國的競爭中處於劣勢。在“改憲”的同時，日本積極“入常”，企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軍事上保持獨自的對中國的抑制力量，這些都是對付中國的所謂“平衡器”（equalizer）。這個平衡器是在美日同盟的掩蓋之下，日本人悄悄設定的。可以說，美日同盟與日本的另起爐灶成正比關係，美日同盟的調門越高，日本另搞一套的機會越大；美日同盟是顯性的全球戰略，日本另搞一套則是隱形的。在國際社會不大注意的情況下，日本逐漸強化自己的戰略實力，底線是不直接挑戰美國利益。

早在 1997 年，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日本尋求進入安理會，並成為常任理事國。聯合國是二戰之後戰勝國的國際組織，與日本、德國無緣，五個常任理事國，美、英、法、中、俄，皆為二戰勝利貢獻最大的國家。可是日本在美國的旗下成了民主國家，而且由於它的富有，成了戰勝國組織的最大的“贊助人”之一。2005 年，

聯合國成立 60 年，日本、巴西、德國和印度組成的“四國聯盟”，提出擴大安理會的提案，由於韓國、意大利、阿根廷、巴基斯坦等國的反對，美國和中國不支持，難以得到 191 個國家中三分之二的支持而被作廢。但是，日本“入常”依然還是一個問題。2007 年 9 月 25 日，布什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講時稱，願意考慮擴大現有 15 個理事國的聯合國安理會，還說“日本完全具有成為常任理事國的資格”，同時又說“還有其他國家”也有資格。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通過電話舉行的日美首腦會談，向布什表示了謝意，並在 10 月 1 日國會施政演說中表示“將以成為常任理事國為目標。”

為了防止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濫用否決權、非民主問題的進一步惡化，日本和其他有影響的國家，謀求一個沒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席位，似乎無可厚非。不過，美國實質上不願擴大安理會，認定一旦擴大安理會，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實施產生影響。日本是美國的老二，附庸國，美日同盟要為美國的全球利益服務，一旦日本“入常”，附庸也許有一天會成為對手。美國在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支持”，因為有許多事情還得由日本出面去做，布什總統親自出面表態，就是在這種微妙的背景下發生的，這是美國的“苦衷”。美國很清楚，光日本一家“入常”，而不顧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願望，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但對待日本，人情還是要送，而且不得不送；這個面子還得要給，而且不得不給；這個外交文章還是要做，而且不得不由總統親自出面來做。至於能否實現，美國可用“不由美國一家而定”為由，振振有詞的解釋，日本也深知這位盟友言不由衷，口惠而實不至，但也只能“表示感謝”。

除了“入常”之外，日本“強兵”動態更值得注意。首先，2007 年 1 月 9 日，1954 年成立的日本“防衛廳”，昇格為“防衛省”。安倍首相在紀念儀式上說，冷戰結束之後，日本的安全保障環境“發生了變化”，日本有必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防衛力量的作用”，這將是“日本擺脫戰後體制、建設新國家方面邁出重要的第

一步”。“廳”和“省”雖一字之差，可是，防衛大臣的地位高於防衛廳長官，享有與其他內閣成員同等的權限，能夠就國防問題和法案提議召開內閣會議，還可以直接向財務大臣提出預算要求。而根據“周邊事態法”，對美軍的“後方支援”，被提昇為自衛隊的“基本任務”，不再是“專守防衛”時代的“附加任務”。再根據《反恐特別措施法》和《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別法》，自衛隊在海外的活動也被定位為“基本任務”。防衛省昇格一事，已經改變了“和平憲法”的國家體系，特別是國防部門低級別的基本特徵，提高了國防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防衛大臣接管了以前由首相掌握的海外派兵、對美物資支援等權限，強化了“緊急事態”應對體制和國際參與，提高了國防部門的參與決策能力。

戰後日本依“憲法”規定，只有少量的自衛隊，任務定位為“專守防衛”。在英文表述上，自衛隊本來是 Self Defense Force，但是，現在的用詞早就直接了當變成“Japanese Army”（日本陸軍），“Japanese Navy”（日本海軍），“Japanese Air Force”（日本空軍）。根據防衛省 2007 年的《防衛白皮書》，自衛隊的編制總人數約為 26 萬人，陸上自衛隊 16 萬，海上自衛隊 4.6 萬，航空自衛隊 4.7 萬，還編有 4.8 萬人的預備役，可根據戰時需要迅速補充兵力。自衛隊員是職業兵，教育水平普遍較高。又由於一直重視儲備骨幹，現役部隊中少尉以上軍官約佔 20%，士官約佔 55%，官兵比例高居發達國家首位，一旦需要可迅速編成上百萬軍隊。在裝備方面，航空自衛隊裝備有 370 架戰鬥機，近 76% 為“第三代戰鬥機”（韓國的第三代戰鬥機比例 47%），並且正在開發自己的 F-22 “心神”戰機。海上自衛隊現裝備各類艦艇共約 160 艘，總噸位在 45 萬噸以上，其中包括七艘“宙斯盾”驅逐艦（2008 年初第七艘投入使用），至少 16 艘潛艇和一艘准航母。陸上自衛隊擁有坦克約一千輛，裝甲車約 1300 輛，各種火炮約 6400 門。日本自衛隊的武器裝備的總體性能，在亞洲處於領先地位，部分

裝備甚至高於美軍。

日本的軍工體制是“寓軍於民”，上千家“民營企業”參與軍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三菱電機、三井造船等都具有軍工生產能力，可以建造飛機、艦艇、坦克、大炮、“愛國者”導彈、武裝直昇機。日本的大企業，以及企業集團保持著鉅大的軍品生產能力，如果將 5% 的汽車生產線轉產坦克，坦克的年產量可達 1.2 萬輛；如果將 20% 的造船能力轉產軍艦，可年產 70 萬噸軍艦。2006 年，日本軍事科研經費為 1714 億日元，比 70 年代初增加 20 多倍。日本在很多軍事科技領域搶佔制高點，諸如半導體、微電子、航天、核能、高速計算機、人工智能，皆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軟件、雷達、通信等領域也保持相對優勢。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具有可靠的財力。近年來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日本加速了“強兵”步伐，逐步由“專守防衛”轉向“主動先制”戰略，不動聲色的發展先進武器裝備，悄然完成再一次“強兵”的戰略轉型。1993 年以來，日本軍費一直居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相當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軍費支出的總和。軍費支出很大一部分在更新、購買武器，其中大部分用於採購大型和重型武器。比如 2007 年，日本用 2499 億日元採購了 50 架不同機型的飛機，與美國談判購買 F-22，並對現有的 F-15J、F-4EJ 的電子系統進行改進，提高作戰性能。同年，日本用 1063 億日元製造了排水量 1.8 萬噸的“日向”號驅逐艦，也就是所謂“直昇機航母”。到 2008 年，日本已經擁有七艘“宙斯盾”驅逐艦，加裝美國“標準-3”導彈，預計到 2010 年日本將在全國 11 個基地部署“愛國者-3”導彈，建立最密集的導彈防禦體系。在太空領域，日本也顯示了強大實力，如 2007 年日本就發射了一顆“月亮女神”，並宣稱將在 2025 年建立載人太空站。日本具有建立軍事強國的經濟、技術基礎，如果需要，用 3~5 年時間，日本可以依靠先進技術，將自己的軍力大幅提高。

日本的統治力和在國際問題上的決策力，歷來是被西方人嘲笑的对象。2008年北海道舉行G8峰會，英國媒體刊載了諷刺畫，說“日本失蹤”了。的確，深藏在美國背影之下的日本，在解決國際問題會議上，往往沒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缺乏存在感。但是，日本絕非低能兒，善於只做不說。從戰後經濟奇蹟和應對長期經濟蕭條的過程中，人們也無法忽視它的韌勁。20世紀80年代，日本就提出過做“普通國家”的目標，其思想源於大平正芳內閣（1978~1980年）的“綜合安全保障戰略”。1983年，中曾根康弘內閣（1982~1987年）強調要把日本建設成“普通的國際國家”，此後，歷任內閣都堅持了“普通國家”論，並以“國際貢獻論”為藉口，挑戰和平憲法的禁區，為擁有軍力的“普通國家”準備條件。2003年11月，小泉純一郎說：“如果日本採取非武裝中立的國策，不擁有軍隊，那麼一旦受到侵略，由誰來保衛國家？”他強調說“自衛隊就是軍隊，這是常識，因此，日本要修改表達方式，避免出現自衛隊違反憲法的議論。”2006年7月，朝鮮試射導彈，當時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公開表示，有權先發制人攻擊別國，此後日本擁有“先發制人”攻擊權利和能力，被認為是理所當然。2007年，圍繞“改憲”和“強軍”，日本政界鬥爭激烈，結果是在爭論中實施了不少“強軍”舉措。

政界的論戰和媒體的報道，諸如美國的反恐戰爭、北朝鮮的威脅、中國的崛起，不斷地造就“改憲”和“強兵”的民意基礎。冷戰之後，日本社會黨勢力大衰，日本共產黨不得不安於“萬年野黨”的地位，議席位越來越少。新成立的民主黨，經歷了十幾年的政局變化，既有老自民黨的血統，也有老社會黨的餘脈，在“改憲”問題上歧義迭出。泡沫經濟崩潰，國際形勢的大變革，自民黨的與美國“接軌改革”和民主黨的“兩大政黨”體制的思維，逐漸贏得了選民。所以2008年大選，一方面自民黨保住衆議院的多數席位，另一方面民主黨則拿下了參議院的多數。必須注意的是，日本朝野



兩黨的政策，在“改憲”問題上差別很小，可以說是“改憲”主流。至於民意，如上所述，贊成者佔多數，還有就是不關心。在這個背景下，日本政治家才敢於明言在“有事”時，可以採取“主動先制”的積極防禦戰略。2007年，政府的智囊機構“日本戰略論壇”在研究報告中建議日本應擁有“先制打擊”導彈基地的軍事能力，建議加強現有戰鬥機的對地攻擊能力，在艦艇、潛艇上裝備“戰斧”巡航導彈，並努力引進F-22戰鬥機。2007年11月13日，衆議院通過了新的《反恐特別措施法》，即《關於為海上阻止行動反恐實施補給支援活動的特別措施法案》，提交參院。2008年1月11日，參議院全體會議否決了該法案。當天下午，衆議院全體會議再次表決，憑藉超過三分之二的贊成票通過了這個新《反恐特別措施法》。該法是為期一年的時限法，用於替代9.11事件後出臺、經過三次延長、於2007年11月1日到期的《反恐特別措施法》，目的是恢復日本海上自衛隊在印度洋的補給支援活動，包括給參加海上反恐的外國軍隊的艦船供油、供水和提供勞務。

此外，2007年4月20日，日本國會通過了《海洋基本法》，首相為“綜合海洋政策本部”的本部長，旨在促進海洋資源開發、海上交通安全的基本政策，強調要採取必要措施保護孤島。這個舉動無疑與韓國的“竹島”問題、與中國的釣魚島問題密切相關。海上戰略佈局，重點在西部和西南方向，目標是以沖繩為依託，構築一條封堵中國進出太平洋的戰線，與美軍加強第二島鏈的戰略互相呼應。同時，日本提出“領域防禦”的概念，把包括偏遠孤島和專屬經濟區在內的廣泛領域作為其防禦範圍。根據日方的解釋，“領域防禦”範圍包括國家領土、領海、領空、海上航線、偏遠孤島及專屬經濟區。日本號稱擁有六千多個島嶼，大多分佈在日本列島的西南，這些島嶼及其447萬平方公里的領海，都屬於“領域防禦”範圍。這樣一個規定日本的海上防禦，護航擴大到“領域防禦”，由“線”擴大到“面”。在深化美日軍事合作的同時，也加強與澳

洲和印度的防務合作，對中國則採取有表有裡的兩面策略。一方面，日本對中日軍事交流抱積極態度，另一方面，則嚴重戒備中國強軍。從日本加強西南軍事部署、與中國爭奪海洋權益來看，牽制中國的意圖十分明顯，對處理臺灣問題，東海資源問題形成挑戰。釣魚島本身不大，然而周邊擁有 74 萬平方公里的“海洋經濟區”，幾乎等於南沙群島海域的總和。釣魚島處於臺灣、中國大陸及日本沖繩之間，距大陸 180 海里，距沖繩 225 海里，距臺灣 90 海里，屬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如果日本控制了該海域，可能阻礙中國海軍向太平洋縱深進出。

如果說釣魚島是“守”，那麼臺灣海峽就是“攻守兼備”。日本防衛省內部有一個基本共識，“臺海有事”等於日本“有事”。臺灣海峽關係日本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假如臺灣海峽發生戰事，美日勢必介入，美國講它的“道義”，日本講它的利益。美軍已經完成在西太平洋的戰略部署，應對臺海可能發生的危機。如果發生戰事，美軍可以出動 3~5 個航母艦隊進逼，駐日航母戰鬥群可在 72 小時內抵臺，這是反應最快的海上機動部隊。2006 年，美軍集結“小鷹”、“里根”、“林肯”號航母，2007 年美軍再次集結“小鷹”、“斯坦尼斯”、“尼米茲”，在關島實施軍事演習。這兩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集結不同的航母艦隊，是期望錘煉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戰事中，美軍航母可以適應環境，協同作戰。美軍駐日空軍第三代戰鬥機總數達 372 架，幾乎與中國空軍目前裝備的全部第三代戰鬥機數量相當。2008 年，駐日十餘年的“小鷹”號退役，核動力的“華盛頓”號接替。進入 2009 年，美日頻繁軍演，目的可能是提昇美日兩軍的協同作戰能力。不久前，希拉里國務卿首次外訪訪問日本，兩國就從沖繩撤出八千人計劃達成協議，此舉既有緩和與日本民間感情問題，也有支持日本“強軍”的含義。在重整東亞戰略部署之後，這種部分的撤出，決不影響美軍的存在，相反美國留出了戰略空間，可以觀察“改憲”後日本的軍事動態，並監視中

國。

2009年2月，反對黨領袖小澤一郎，基於他的美、日、中對等的戰略思維，最近再次提出美軍第七艦隊“駐留足夠論”，受到左右兩方的強烈關注。<sup>8</sup> 美國堅持空軍和陸戰隊的戰略意義，批評他破壞美日同盟，將日本安保置於危險境地。左派則認為他的含義在於獨自擴軍，如果那樣軍費將達到日本GNP的3~4%，<sup>9</sup> 也無法容忍。美國戰略研究所的哈姆萊則明確指出，假使如此，美國將與日本產生“距離感”，不允許消弱美軍在日本的存在。可以說，一方面允許日本“改憲強兵”，一方面保持一定數量美軍在日本的存在，同時強化以關島為重心的“第二島鏈”，是目前美國及其軍隊的基本態勢。

#### 四、日本的憲政史和國家性格

回顧一下日本憲政史，有助於理解“改憲”。日本國家性格和日本的國民性一樣，具有雙重性，兩面性。日語常說“Omote（表）和Ura（裡）”，“表裡不一”可能倒是常態，這一點與美國的國家性格極為不同。明治維新到戰前（1868~1931年），日本主要仿效歐洲強國，憲法與憲政皆源於德國，戰後才轉向美國。如上所述，量身定做日本憲法“洋裝”的是伊藤博文（1841~1909年），此人長州藩（今山口縣）出身，早年師從儒家人物吉田松陰“尊皇攘夷”，在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第一代領袖之後，成為日本政治的中心人物。他與李鴻章多次交手，梁啟超的《李鴻章傳》對二人多有比較。1885年，日本實行內閣制，44歲的伊藤出

---

<sup>8</sup> 日本《日本經濟新聞》2009年2月26日。

<sup>9</sup> 參見對美國戰略國際研究所哈姆萊所長談話的報導（日本《日本經濟新聞》2009年3月2日）。

任第一任首相，安倍晉三算是他的同鄉晚輩。1840 年的鴉片戰爭，1853 年美國佩理黑船來航，幕府政權不知所措，在此外力衝擊之下，以薩摩藩（今九州）、長州藩為代表一批下級武士得以參政。1864 年，長州的“攘夷派”聲稱要效法林則徐，攻擊了英美商船，導致與英、法、荷、美四國聯軍的下關戰爭（即馬關戰爭 1863~1864 年）。1863 年，由於英國人疏於日本的禮節，被薩摩武士殘殺，又引發所謂“薩英戰爭”。不過，英國的對日政策與對華政策不同，當時的英國並不想佔領日本領土，通商條約簽定之後，日本被殖民地化的危機也小於中國。然而，中華帝國“華夷秩序”及其觀念對日本士族影響極深。中國在中西方衝突下的失敗，刺激了日本的危機意識。戰爭讓日本知道“攘夷”必“師夷之長技”，為此只有“開國維新”。和隋唐時代日本全面吸收中國文化一樣，日本在工業化經濟體系、文化、政治制度方面，也在形式上全面吸收，又堅持“和魂洋才”的看似矛盾的雙重立場，這與二戰之後的效法美國一脈相承。

在西風東漸“船堅炮利”的 19 世紀，“明治維新”對日本歷史具有深遠影響。日本既非西方也非基督教國家，它的“百年憲政”是一個另類，創造了一個先例。日本為什麼搞憲政，換“洋裝”？如何搞出的憲法？史家說，日本只是為了拿到進入西方列強“俱樂部”的門票。的確如此，但並非全部，更重要的是日本建立歐式“民族國家”的實際需要。江戶時代（1603~1867 年），日本與歐洲尤其是德國十分相似，日本列島 274 個藩國，天皇“無為”，德川幕府“征夷大將軍”為諸侯領袖，叫做“藩幕體制”。各地藩主“大名”要到江戶“參勤交代”，彙報工作。天皇住京都，做他的精神領袖，藩閥各自為政，藩士忠於藩主，各藩之間則劍拔弩張，沒有那麼和諧。從“尊皇攘夷”到維新政府成立後的十餘年，藩主和藩士，強藩之間，強藩與中央之間，發生過一系列激烈的矛盾和衝突。殖產興業，富國強兵，要求國家統一，相對集權的民族

國家和國家認同意識，這才是日本不得不實施憲政的關鍵。1868年3月，天皇召集公家（天皇家臣）、大名（藩主）頒佈了《五條誓文》，曰“廣開議會，萬機公論；上下一心，盛行經綸；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打破舊來陋習，以天地公道為歸依；求知於世界，以大振皇基”云云，規定了學習世界文明，建立立憲國家的大方向，同年，天皇從京都移住江戶，改江戶為東京。1869年，各藩主將土地、人民歸還天皇，叫做“版籍奉還”，但軍事和課稅權還在諸藩。1871年，政府以天皇名義實施“廢藩置縣”，軍事與民賦皆歸於中央，同時廢除身份制度，四民平等。藩主和公家為華族，藩士和舊幕臣為士族，百姓和町人為平民，平民可有名字（只要不是舊貴族，日本人的姓氏皆為那個時代自造，河邊、山下之類，姓氏之多世界第一）職業選擇、居住、結婚自由，並改革兵制、稅制、學制。

1889年，日本公佈了歐式憲法，正好是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發表一百週年。明治維新不是法國的市民革命，而是士族革新，自我改造。立憲過程自上而下，所以“明治憲法”用的依舊是君主制的語言，比如“臣民的權利與義務”、“法律規定範圍內的言論自由”之類。維新之後，圍繞富國、強兵、國內體制三大課題，各派力量激烈鬥爭，應當說是一個混亂期，一個新舊體制的轉型期。明治天皇（1852~1912年）之下，日本至少存在著三大勢力：一是274個藩主及其貴族，尤其是薩、長、土、肥四大強藩。大政奉還之後他們享有中央政府議事地位，其他藩主則依舊主持地方行政。“廢藩置縣”之後，政府命令舊藩主移住東京，實現了政令、官制、軍隊的統一，只保留了華族、士族的身份制度。三千華族有飯吃，180萬士族卻有不少人失業，故不少人對新政持反對態度。二是締造維新的志士，政治精英集團。他們最初大都是各藩的下級武士，參與攘夷倒幕，而後到西方考察，瞭解了西洋的情況，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年）、木戶孝允（1833~1877年）、伊藤博文、

山縣有朋（1838~1922年）、大隈重信（1838~1922年）都屬於這種精英。這批人的思想是近代化和國家主義，形成一個較長期的主流派（西太后 1835~1908年，與這些人時代相近）。在很長一個時期，他們主持國政，在官界、財界、學界形成一股新興勢力。三是明治政府的非主流派，如西鄉隆盛（1827~1877年）、阪桓退助，他們與精英集團經歷相同，但對於那批人的政策持不同政見，下野之後，或與失意氏族結合造維新政府的反，如西鄉隆盛；或走民間路線，提倡民權，主張早開國會，與主流派分權，如板桓退助。

利益集團的政爭，貫穿整個近代日本。早期有所謂西鄉隆盛的“征韓論”，想通過教訓韓國的戰爭給失意的氏族找飯碗。他與重視內政的當權者發生矛盾，引發“西南戰爭”，“明治三傑”即反叛的西鄉，政府領袖大久保與木戶的戰爭。西鄉兵敗自殺，木戶想調節西鄉和政府關係，勞心過度而病亡，大久保不久也被氏族刺殺。氏族衰落，政府體制內“精英專權”，推行從上到下的國家主導工業化，開後發“國家主義”之先河，伊藤博文為其代表人物之一。“民權派”則主張培育民間資本，以穩健的立憲制度抑制“精英專權”，開社會黨及民間組織之先河。以“脫亞入歐”論知名的福澤諭吉，指彼輩的主張為過激，明確提倡以實業家、地主、知識人、官僚所構成的“上流民權”，即“精英政治”。19世紀70~80年代，精英的立憲論，又分裂為大隈重信的“英國式議院內閣制”和伊藤博文、井上毅、井上馨的普魯士式的“君主立憲制”。前者立意以執政黨為中心統一行政與立法，遭到民權論者的反對，要求立法與行政分離，保守的法學家則擔心天皇的權利可能被政黨削弱。1882年大隈無視反對意見，獨自上書，建議次年舉行總選舉，再次年召開國會。明治政府為了早日得到西方列強的承認，也有早日立憲的企圖，然而由於大隈捲入經濟事件，1882年10月被免掉了參議職務，立憲和召開國會的一件大事就此推遲了近十年，主導權被伊藤拿到手裡。

1882年3月，伊藤博文率領一批官員，以普魯士為中心考察歐美憲政，在歐洲學習了一年零三個月。1870年的“普法戰爭”，普魯士打敗了法國拿破侖三世，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國，終於結束了三百個小邦國分崩離析的局面，有了自己的民族國家，憲政和議會，卑斯麥當政。伊藤在此時代留德，所受影響極大。他師事奧地利法學家勞倫茨·馮·施坦因（Lorenz von Stein），此人從法國大革命以後一百年歐洲經驗出發，從理論上說明何以“君主立憲”之下，“行政”與“立法”的分離為最佳選擇。施坦因住在維也納，書房被保留下來，如今成了日本歷史家、旅遊者的“朝聖之地”。伊藤之後無數的政治家、官僚、學者訪問過施坦因，因為年老，他本人未能來日本當“國策顧問”，由他兒子代勞。原來傾向於法國式自由主義的伊藤，通過比較英、法、德的政治體制，特別是“多數理論”與普魯士的君主立憲，得出了君權在憲法之上和成立所謂“超然內閣”即非政黨內閣為最佳的結論。“明治憲法”的內在矛盾，正在於君權與內閣責任不清，到底是“君權至上”，還是“責任內閣”。明治憲法第五條規定，“國務大臣有輔弼天皇之責”，體現了君權在憲法之上，責任關係曖昧，而政權長期在藩閥之手，軍閥又源於藩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單日本的戰爭到底是“天皇責任”還是“軍閥責任”無法確定，所謂憲政民主根本就沒有運作起來。天皇對內閣、軍隊的統帥只是“認可”，很少反對或駁回，實際上是“只君臨不統治”，民主主義還在強權的陰影裡掙扎。

1890年7月1日，日本舉行第一次選舉，但“有（選舉）權者”只限於納稅15日元以上25歲男子，全國不過25萬人，1%而已。當時，國稅的97%是地租，日本是農業國，故“有權者”主要是農村地主和社會精英。昭和初年的1928年，不再限制納稅額，“有權者”擴大到1250萬，有了政黨政治。戰後，美國強制推行“民主改革”，日本追隨美國亦步亦趨，到1955年則是保守

派大聯合，自民黨長期“一黨執政”，至今沒有搞成美國式的兩黨制輪流執政。由此看來，日本政治長期以來就是“精英政治”？這又是一個表裡不一、似是而非的問題。一百年憲政史，反抗勢力一直存在，階級鬥爭貫穿始終。明治到昭和初年，日本走過一段“典型資本主義”，資本集中，貧富分化。美國有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鋼鐵大王卡耐基、鐵路大王哈里曼，日本有三井、三菱、住友等一大批財閥，勞動者水深火熱，普羅文學和劇作流行，甚至於影響到中國。勞農黨、社會黨、共產黨，應運而生。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也是日本，中國共產黨、朝鮮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多在那裡接受馬克思主義。正因為非主流，在野勢力、反抗勢力、民間維權力量的長期存在，造就了日本現在的“非典型資本主義”。明治以來民權運動的歷史，社會黨、民主黨等野黨以及工會運動，各種社會集團的政治參與，推動了政治的開放競爭過程，形成和精英對抗的多元政治，各種利益集團的協調，多元的競爭與協調，最終形成統一的“合意”，並迅速實施，這也許才最體現日本政治的特色。

關於歐洲的憲政民主，馬克思有過經典的分析。1848年，法國共和主義的憲法，人身、出版、言論、結社、集會和信仰等等的自由，都穿上憲法制服而變為不可侵犯了。不過，“憲法的每一節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語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sup>10</sup> 有趣的是，他的分析也適用於遠東日本的憲政史。1912年，59歲的明治天皇死去，大正天皇繼位，當政者是桂太郎內閣（1908~1911年）。大清帝國崩潰了，民國登場，桂太郎的政策是“日英同盟”，要對抗美國的“東亞擴張”。舊藩閥和官僚依舊主政，桂太郎的第三次內閣（1912~1913年）受到藩閥和軍人勢力和黨人勢力兩方面的攻擊，

---

<sup>10</sup>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16頁。



以“不信任案”而倒閣，執政僅 53 天，他本人很快病死。此後山本權兵衛當政，他是海軍出身，沒有政黨背景，主要閣僚來自“政友會”，實力人物是原敬任內務相，元老的政治影響力逐漸衰弱。1914 年，西門子事件被揭露，在德國製造的海軍主力艦工程有貪污受賄，山本內閣總辭職，元老再次復活，76 歲的大隈重信第二次組閣。從 1912 年到 1914 年，三年時間，桂、西園、桂、山本四屆內閣，官僚和政黨政治此消彼長。1914 年 6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要求日本出兵青島助戰，8 月 23 日，日本對德國宣戰，2.9 萬日本兵與 2800 英軍共同作戰，11 月 7 日德國在青島的守軍投降，日本海軍還打到南洋，佔領了德領南洋諸島，1917 年甚至派 13 艘軍艦到地中海，以馬爾他為基地助戰。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向袁世凱政權提出“二十一條”，引發“五四運動”。憲政歐洲和日本，實質的帝國主義，剝奪他人的自由。在他們那裡，可以對“非文明國家”（uncivilized country）實行殖民統治；列強之間的戰爭，勝者可以接受敗者的權益，但不能損害其他“文明國家”的權益。“日俄戰爭”勝者日本，奪取了“滿洲”權益；第一次世界大戰勝者日本，拿走德國在中國的權益；在列強看來天經地義，中國不是他們所謂“文明國家”。不過日本胃口太大，要求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僱傭日本顧問，要求日本人進入警察局，要求進口日本武器，並要中國“對外保密”。密約事一暴露，英美反對，中國抵制日貨，英國從此時開始，已經在討論結束英日同盟，並在 1921 年華盛頓會議上實現。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幾乎毫無損傷，並獲得鉅大利益。1914~1919 年，其紡織業增 153 倍，造船 112 倍，金屬 24 倍，GNP 年平均增長 28.5%。1916 年，討厭民主主義的元老們推出寺田正義當首相，再次排斥黨人政治。1917 年寺田內閣（1916~1918 年）給段祺瑞政權借款，金額達 1.45 億，佔日本當年財政支出的 20%，目的是擴大日本在華利益。1917 年“十月革命”，列寧要退出帝

國主義戰爭，被指為違反《不單獨講和協定》，各國出兵干涉。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亞 7.24 萬人，美國九千人、英國 5800 人、中國二千人、法國 1200 人，日本人數佔第一位。軍事需求給日本國內帶來通貨膨脹，大米漲價，各地發生所謂“大米騷動”。寺田內閣倒臺，代之而起的是原敬立憲政友會的“黨人內閣”。原內閣（1918~1921 年）繼承了桂太郎的政策，政策中心在富國，強調鐵路、公路、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和教育的振興，國防和軍費得到適當的制約，並且在外交上調整對中國的政策。1918 年巴黎和會，英美各國皆由總統、首相參會，原敬剛剛上臺，為處理“大米騷動”實行“新政”而無法外出，只好派元老西園、貴族牧野伸顯出席。日本要求山東權益，中國參戰，本來有權收回山東主權，由於美英的對日妥協，締結了出賣中國主權的協約，激起了中國“五四運動”。韓國殖民地化之後，一直由軍人當政，1919 年 3 月，爆發了獨立運動，慘遭鎮壓。同時，日本國內勞工的“維權運動”日益激烈，川崎造船所 1.6 萬工人遊行示威，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資，實行國際通行的八小時工作制。1920 年，八幡制鐵 1.3 萬工人罷工，要求改善待遇，八幡市全市騷亂，遭到軍警鎮壓。

明治憲法規定了“天皇主權”，也規定了天皇以帝國議會的協贊行使立法權。其第 37 條又規定，“舉凡一切法律必須經過議會的協贊”，兩條合來就限制了天皇的主權。關於軍隊，有天皇的統帥獨立權，天皇統帥陸海軍。在憲法解釋上，元老、軍人、黨人可以各執一詞，在輔佐天皇的統治權上，沒有明確地規定，重要的國家大政往往只得由天皇和元老來“調停”。元老推薦的首相，明治天皇沒有一次否決過；議會通過的法律議案，受命組閣的首相的組閣過程，明治天皇從不介入，也從未罷免過首相或閣僚。藩閥之間、藩閥與政黨之間的衝突和對立，議會失去功能時，也是天皇解決危機，維持憲法的和諧運作。大正時代，天皇本人缺乏調停力，更多依賴元老，而政黨政治則在此狀況下成長起來。圍繞明治憲法中天

皇的定位，早在 1911 年就有東大教授美濃部達吉反對穗積八束教授的“天皇主權”說，反對將天皇權利“絕對化”，提出了“天皇機關說”。美濃部認為，國家作為法人享有統治權，天皇只是行使統治權的“國家最高機關”，內閣、國會也是“國家機關”，國民總體都可以看作是“國家機關”。“最高機關”的天皇不能無視內閣實行獨裁，內閣則要對議會負責，隨著國民素質和政治自覺的提高，議會應當由國民普選產生，故在明治憲法之下君主立憲，也可以實現“議會民主政治”，議會代表國民的意志，在相互制約中憲政體制才能發揮其功能。反之，天皇主權說實際上排斥了政黨政治和議會的決定權。“天皇機關說”得到政界和國民的多數贊成，而在昭和軍人當政時代，“天皇機關說”則被斥為大逆不道。明治憲法的這種內在矛盾，成為後來軍閥暴政的工具。

為了克服明治憲法中的“君權”和“民權”的矛盾，吉野作造提出了“民本主義”的思想。此人早年在中國教書，是袁世凱兒子的老師，與李大釗也有舊交。1916 年他發表題為〈論憲政的本義及其有終之美的途徑〉一文，以後又發表一系列文章，以“民本主義”翻譯“Democracy”，沒有用“民主主義”概念。吉野認為，明治憲法制約了國民主權，“民主主義”的譯詞不適當，“民本主義”概念指國家主權的基本目標在於國民的幸福和政治參與，其發展過程有三個階段。一是“布爾喬亞”階級用議會限制王權和貴族特權的階段，實現“議會內閣制”。但是，“議會內閣”往往只代表“有產者”的利益，政黨也受到“有產者”即“有權者”的操縱，要克服這一缺點，只能實行普選，以反映勞動者大多數的意見，這是民本主義的第二階段。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已經完成了這個階段的課題。然而政黨政治，普選所代表的政治平等，並不能解決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因此以社會政策實現社會經濟的平等，就成為民本主義第三階段的課題。政黨政治和普選問題，吉野的思想並不新鮮，但吉野借用中國儒家概念，通俗易懂，且通過報刊雜

誌廣為流佈，直接引導了 1919 年的普選運動。吉野不僅是思想家，還是社會活動家，組織了學生和社會團體，普及其民本主義。同時他同情中國的五四運動和朝鮮的獨立運動，認為“五四運動”的反軍閥、反侵略及其排日運動和日本的“民本主義”運動是一致的。1919 年朝鮮發生“水原事件”，數十名朝鮮民衆被殺，作為東京帝大教授的吉野公開批判政府的殖民政策，指斥為“野蠻”，他還將個人收入用於援助中國、韓國的留學生。1924 年吉野離開東大，進入朝日新聞社，同年還是因為政治批判而被免職。吉野和他同時代的一批公共知識人，推進了普遍選舉和一種民主的社會風氣，萊肖爾曾說“大正民本主義”為日本戰後“民主體制”作了鋪墊，可是在當時根本無法改變日本走向戰爭的歷史。

一戰之後，美國代替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開始實施自己的全球戰略。1921 年“日英同盟”到期，美國當然不希望看到這個同盟繼續。1921~1922 年華盛頓會議，列強的亞太利益再分配消滅了“日英同盟”，認可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政策。關於軍備削減，美、英、日、法、意的主力艦艇數量有個比例數字 5 比 5 比 3 比 1.67 比 1.67。關於中國，則就主權和獨立、工商業的機會均等，以及日本歸還山東半島和撤軍達成了協議，中國在《九國公約》上簽了字。原敬內閣的日本接受了美國主導的“華盛頓體制”，他被殺之後，依然是元老和官僚當權，經歷過高橋繼任內閣（1921~1922 年）、加藤友三郎內閣（1922~1923 年）、第二次山本內閣（1923~1924 年）和清浦內閣（1924 年 1~6 月）。1924 年選舉，憲政會加藤高明、政友會高橋是清、革新俱樂部的犬養毅，所謂“護憲三派”獲勝，加藤內閣（1924~1926 年）成立，再次開啟政黨內閣的時代。1925 年加藤內閣制定了《普通選舉法案》，也被叫做《男子普選法》，只有成年男子可以參加普選，取消了納稅額限制。同時，面對弱勢群體的“勞工勞農”運動，又制定了限制言論自由的“治安法”，旨在反對蘇聯革命影響下的共產主義運動。1926 年加藤病

死，若規禮次郎內閣（1926~1927年）上臺，大正天皇去世，日本進入昭和時代。1926年7月國民黨蔣介石開始了北伐，若規內閣採取了“不干涉”的對華政策，重點解決經濟問題，引起了元老和軍部的不滿。臺灣銀行緊急救濟敕令案被樞密院否決，若規內閣辭職，田中義一內閣（1927~1929年）上臺。田中一方面用高橋是清作藏相，控制金融恐慌，一方面出兵山東，干涉北伐，並召開所謂東方會議，提出“滿蒙特殊權益論”。1928年，日本舉行第一次普選，田中為總裁的立憲政友會在衆議院得217席，以濱口雄幸為總裁的立憲民政黨得216席，無產者政黨也獲得了幾個席位。1928年6月，張作霖退回東北，在皇姑屯被關東軍暗殺，田中最初表示不知情，要嚴懲當事人河野大佐，後則否定關東軍參與其事，遭昭和天皇斥責而辭職。除東三省之外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宣佈廢除與日本的通商條約，美國政府7月25日承認國民政府，11月張學良易幟，日本對華外交又告失敗。

田中內閣倒臺之後，反對黨領袖濱口組閣（1929~1931年）。他提出施政的“十條政綱”，包括開明政治、整頓綱紀、中日親善、軍備縮小、確立社會政策等等，得到國民廣泛支持。1929年，英、美、法、日、意五國在倫敦召開“海軍縮減軍備會議”，就輔助兵艦、巡洋艦、潛水艇的保有數量也作了限制。日本的總數量被限制在美國的69.75%，巡洋艦為美國的60.2%，低於70%的原案，潛水艇5.27萬噸，也低於原案的7.85萬噸。強硬派要求不惜會談破裂，堅持原案，濱口內閣則接受了會議的議案。海軍加藤寬治大將堅決反對，昭和天皇依憲法的慣例同意內閣的決定，加藤則希望再上奏天皇，被阻。政界、軍界、民間國粹派要究明此事真相，最後變成濱口內閣侵犯天皇的統帥權。以此事件為契機1930年4月“軍部”一詞開始廣泛使用，利用明治憲法中統帥權獨立，軍部也開始獨立行動。與此同時，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波及日本，1929~1932年失業人口從30萬人(4.3%)上昇到49萬人(6.9%)，

勞資糾紛頻繁發生，農村更加貧困，少壯派軍人開始叫嚷國家改造，遵奉北一輝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想。在這種風潮之下，1930年11月，濱口首相在東京車站被刺中重傷，1931年抱病參加國會，4月死去。民政黨的第二次若規內閣上臺，面對經濟危機，政黨內閣找不到出路，一般民衆開始接受軍部和媒體的“國家社會主義”即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天皇機關說”和政黨政治被否定。軍部、特別是關東軍（根據日俄戰爭之後與大清帝國的關於大連、旅順租借和滿鐵經營權，日本據此而派出的駐軍）企圖佔領全滿洲，將它從中國分離出去。

形式的“憲政民主”，實質的國家主義，對外擴張，奴役他國，這就是日本的憲政史。早在1909年，也就是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被安重根刺殺的那一年，日本制定的《帝國國防方針》說的很清楚，其“用兵綱領”是：第一、在美國艦隊渡洋作戰之前，對其東洋海軍基地菲律賓和關島實施打擊，使其作戰困難。第二、在美國艦隊攻擊之前，完成防衛作戰準備。美國艦隊如來攻擊，在日本本土近海將其擊破。第三、確立不敗的戰略態勢，使美國放棄戰爭意志。可以說，早在20世紀初，美國和日本，互相已經是把對方當假想敵國，此當為太平洋戰爭的遠因。伊藤之死，死在朝鮮人手中，其背景大約有美國勢力的參與，這是符合政治邏輯的推測。伊藤的繼承人大約也有同樣的戰略認識，其中之一就是石原莞爾（21期）和一大批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軍人，包括崗村寧次（16期）、永田鐵山（16期）、東條英機（17期）、鈴木貞一（22期）。1927年這批人就結成“木曜會”（每週四聚會），得出必須控制中國東北滿蒙和日本政治的結論，以後加入的有阪桓征四郎（16期）、磯谷廉介（16期）、土肥原賢二（16期）、山下奉文（18期）、河野大作（15期），9.18事變時這些人大都是校級軍官，形成一股強大的軍事政治勢力。

石原莞爾（1889~1949年）是9.18事件的主謀之一，滿洲國的

構想者。後來因為反對擴大對華戰爭而被當了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免去軍職，下野之後當了兩年大學教授。東條英機在中國人所共知，石原莞爾在中國的史書上僅以 9.18 罪魁被提及。反之，英日文文獻卻極多，甚至被稱為日本“唯一的軍事戰略家”。戰後復興期，著名的官廳經濟學家大來佐武郎等人也曾經到他的隱居地拜訪，問日本國家的再興之計。現在的日本右翼，尊北一輝、大川周明和石原莞爾為三大祖師，他們相同的思想路線是反英反美，不同的是對中國的政策。石原莞爾 1907 年入陸軍士官學校，1909 年畢業，半年後昇少尉，喜讀歷史、哲學、宗教。1910 年被派駐朝鮮，1911 年中國辛亥革命，據說他曾帶著士兵，跑到山上三呼萬歲。1915 年考上陸軍大學，當過駐德國武官，研讀世界史和拿破侖。1920 年在武漢搞情報工作，他思考的對華政策，已經和英美的用錢用兵干涉中國的方法劃了一條界線，要在中國東北建立日本的基地，一方面解決日本的人口過剩和失業問題，一方面對付他認為必然發生的“世界最終戰爭”。1931 年 9 月 18 日，在石原的策劃下，關東軍製造了柳條湖事件，嫁罪於張學良的東北軍，說中國軍隊攻擊日軍，本莊繁司令接受了石原的建議，關東軍全體出動，9 月 19 日佔領滿鐵全線。當時關東軍兵力只有 1.04 萬名，朝鮮駐軍司令林銑十郎未得內閣許可，發兵一個旅團，21 日越過鴨綠江。19 日內閣會議，外長幣原喜重郎懷疑此事件為關東軍謀略，軍部在張作霖暗殺事件之後，以認定昭和天皇凡庸，沒有直接上奏，而天皇明知關東軍的行動，也沒有以自己的統帥權加以干涉。9 月 22 日，內閣會議來了個事後承認關東軍的行動正當，下午參謀長即上奏天皇，得到了許可，日本從此走上擴大戰爭一途，政黨政治只剩下了形式，民主主義根本無法阻止侵略戰爭。

史家評說認為，如若略有膽識的濱口首相還在，完全可能以“干涉憲政統帥權”，不承認關東軍的行動，天皇再來調停，軍部首腦為此作了辭職的準備。然而一切都是“假設”而已，若規內

閣向軍部妥協，只聲明不擴大戰爭。1931年10月天皇委婉地向陸相詢問，“滿洲的事，沒有問題嗎？”另一方面，少壯軍人“櫻會”成員準備暗殺全部內閣人員，雖然沒有成功，其恐怖威壓已在。國際聯盟要求日本從中國的滿洲撤兵，以13票對一票通過了決議，關東軍不為所動，佔領齊齊哈爾，內閣失去功能，既不能解決經濟問題，更不能制約軍部，12月辭職了事。76歲的犬養毅組閣（1931~1932年），政友會內閣還想走國際協調路線，解決和列強與中國問題，然而，1932年1月，天皇對關東軍來了一個“忠勇可嘉”的考語。1932年，上海1.18事件，美、英、法要求停火。1932年2月，關東軍佔領哈爾濱，3月建立“滿洲國”傀儡政權。石原構想是將滿洲合法地並入日本，由於列強的壓力而改為建立獨立的“滿洲國”。軍部要求內閣立即承認“滿洲國”，犬養內閣沒有立即承認。1932年5月15日，24名海陸軍青年軍官分別襲擊了首相官邸、內大臣官邸、政友會本部，犬養毅首相被軍人射殺，是為5.15事件。犬養毅和尾崎行雄曾被稱為“憲政之神”，臨死還在說“說明一下，他們會明白”。殺人的軍人只受輕刑，根本就不明白。元老西園寺受天皇委託，再次出山，與其他元老密謀擇相，最終由齋藤實海軍大將出任，搞起了非政黨的“舉國內閣”。

“滿洲事件”以下克上，違紀違憲，卻得到日本國民的狂熱支持。1931年，松岡洋右在國會演說，批判幣原外相的協調外交，強調“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生命線”一詞，竟成了當年的流行話語。新聞界宣揚，滿蒙是日本血汗的結晶，因為日俄戰爭日本人流了血。學界者流，如東京大學教授蠟山政道，早在1929年就認為政府處理滿蒙問題，必須注意“國民傳統感情”中的“心理事實”。1931年10月，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正在發展，從而使“滿蒙問題”有可能危及“日本民族國家生存的意識形態”，需要向國際社會說明日本關東軍行動的合理性。對於齋藤內閣，蠟山教授認為，那是必要的“立憲獨裁”，並不意味著否定政



黨和議會，而且只要滿足民衆希望的生活，“立憲原則”的“變通”符合社會正義。到這裡，日本的憲政民主已經完結，代之而起的是國家主義軍人的憲政獨裁了。

1933年李頓調查的報告，一方面承認了日本在滿洲的權益，一方面要求日本撤兵和滿洲的國際共管，否定了滿洲國合法性，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同年，岡田啟介內閣（1934~1936年）上臺，軍隊內部所謂“統制派”和“皇道派”的鬥爭激化。“統制派”要調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推行統制經濟，在政治和軍事上反對以下犯上。“皇道派”則要打倒元老、軍閥、官僚、財閥、軍人革命，革新國家。政府在軍人壓力下排除了“天皇機關說”，美濃部的法學著作成了禁書。關於對華政策，岡田內閣提出了三原則，取締排日運動、默認滿洲國、共同防止共產主義，而同時關東軍正在搞華北自治的陰謀。1936年，一批少壯派軍人，在北一輝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下，發動了2.26事件，率1400名士兵佔領了國家中樞，殺害了內大臣齋藤、大藏大臣高橋是清、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將鈴木貫太郎重傷，與首相岡田啟介相貌相似者被殺，岡田本人躲過一劫。在軍人們〈趣意書〉中，明確提出元老、重臣、軍閥、官僚、政黨是破壞國家體制的元兇，要誅滅奸賊，伸張正義。出乎這批年輕軍人意料之外的是，此舉令昭和天皇震怒，原因之一是軍人殺傷了他的老臣鈴木等人，他要親率禁衛軍討伐，起義軍成了叛亂軍，只得向戒嚴部隊歸順，17人被判死刑，包括沒有直接參加叛亂的北一輝。

處理叛亂事件的，大規模肅軍的，是時任參謀本部軍事課長的石原莞爾。9.18事件“以下克上”的名人，這次面臨新一代的“以下克上”。事件之後，上臺的是廣田弘毅內閣（1936~1937年），以後是林銑十郎內閣（1937年）和近衛文呂內閣（1937~1939年）。近衛三次組閣，盧溝橋事件，德、意、日三國同盟，入侵法屬印度支那，都在他的任內發生。盧溝橋事件之後，參謀本部的對華政策

分為兩派，已昇任作戰部長的石原少將從對蘇聯的戰略出發，主張不擴大對華戰爭，東條派的作戰課長武田章大佐則主張增兵，一舉解決所謂“華北問題”。8月13日，戰火擴大到上海，12月日軍佔領南京，1938年1月，近衛內閣發表聲明，不以中國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12月汪精衛逃出重慶，在南京建立偽政府。日本將這次戰爭定位為“建立東亞新秩序”，共同防共，後來又發展為“解放被壓迫民族”的“聖戰”。所謂“左翼”的社會大眾黨最先出來捧場，說日本的對華戰爭是從歐美資本主義下“解放東洋民族”的有文化意義的戰爭，又是日本民族發展的有民族意義的戰爭，還是克服日本資本主義制度矛盾建設“全體主義制度”的戰爭。1940年2月2日，民政黨國會議員齋藤隆夫在國會發表著名的演說，指出近衛內閣對華政策要點是尊重中國主權，要從佔領區撤兵，政府真要實行這種政策麼？如果實行那麼日本的利益何在？國際社會是撤頭撤尾實力競爭社會，能存在為“東洋永久和平”的正義的戰爭？齋藤的反軍演說，實際上已經指出日本對華戰爭無疑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語氣委婉而態度鮮明，軍部人物無言可對，不敢說話的議員拍手稱讚，齋藤被國會除名。

1940年7月，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松岡洋右為外相，東條英機任陸軍大臣。8月，開始所謂“新體制”，效法德國納粹成立“大政翼贊會”，要“萬民翼贊，一億一心，職分奉公”，明治憲法的天皇統治權、君主立憲制全部解體。這種獨裁體制短期見效，德國納粹在很短的時間內，橫掃歐洲大陸，近藤內閣要與德國結盟，德國重建“歐洲新秩序”，日本重建“亞洲新秩序”。昭和天皇問近衛，這個“大政翼贊”不是和“幕府”一樣嗎？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軍事同盟在柏林簽字，對美國外交進入僵局，1941年7月25日，美國凍結日本在美資產，8月1日石油禁運。1941年9月6日，東條英機內閣上臺，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同時佔領馬來半島，對英美宣戰了。被石原戲稱為“上等兵”的東

條英機，1943年召開大東亞會議，發表宣言，日本帝國的軍事擴張發揮到了極致，離滅亡不遠了。最近公佈出來的史料，揭示昭和天皇對於日本與德意結盟持反對態度，日本皇室親英美，與英國皇室也很友好，以致於不願會見希特勒的朋友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浩。但是，德國橫掃歐洲的事實，強化了當時英、法、荷、比不足道，德國稱霸歐洲的意識。日本親德還有國民性上的理由，日本人與德國人性格近似，認真頑固，重形式，守規矩，組織性強。日本人認為，英國人冷淡，法國人輕佻，美國人傲慢，德國是歐洲的“後發國家”，從明治以來日本政官學各界留學德國最多，德國的影響也最深。石原莞爾反對東條的政策，被解除現役中將師團長的職務，回到家鄉農村山形縣，發表言論批判東條的軍事政策，預言日本一定戰敗，甚至於在會見東條時當面叫他辭去首相職務。戰後，美國佔領當局沒有將石原列為戰犯，據說中國方面也沒有將這個 9.18 事件的主要人物列入戰犯名單。日本在官僚軍人的指導下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日俄戰爭以來的日本帝國，40年的戰爭崛起終於結束，日本又回到了明治維新的原點。人們不禁要問，在國家戰略失誤的條件下，“憲政國形”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在戰爭崛起和國家利益主導的世界，日本從列強那裡學到的入歐模式，無非是黃皮膚的海盜，形式的憲政民主，實質的憲政外衣的軍人專制，國家主義。

石原莞爾這個“軍事戰略家”，曾激烈批判東條英機“沒有理念，沒有思想，沒有戰略”；一方面沒有解決對華關係，一方面輕率的擴大戰線與英美為敵，而以日本的國力遠遠無法應付如此大規模的戰爭。面對遠東裁判檢查官們的詢問，石原坦率地說道：“你們說的戰犯，只不過是一些小官僚而已，值得為他們花費這樣多得時間來審判嗎？”按照石原的戰略構想，為對付美國和俄國，從中國分出一個“滿洲國”，足夠成為日本經營後方基地，應該避免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爭。同時，日本與德意聯盟更是絕大的錯誤，是無視英美實力的冒險。不出石原所料，侵華戰爭走入泥沼，對英美開

戰不自量力，決定了日本帝國的失敗。東條之類不知進退的官僚化軍人，愚而自用，窮兵瀆武，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就毀於一旦，還在美國勝利者面前推託罪責。戰後，聯合國軍內部曾經就日本戰後的利益分配有過討價還價，蘇聯提出過恢復“日俄戰爭”前對滿洲的權益，還要求佔領北海道。戰後日本的處理權落在美國之手，美國有了按照其自身的全球戰略改造日本的歷史性機會，日本的“最終戰爭”以失敗而告終。

## 五、中國的對日政策：對抗與協調

對日本的“改憲”和憲政史的分析，有益於認識它的國家性格，也有益於理解其將來的走向。面對“美日同盟”之下日本的“改憲”和“強軍”，中國必須考慮應對戰略和策略。缺乏理性的和歷史的分析，則可能進退失據。一般說來，中日關係與中美關係一樣，既有對抗的一面，也有協調的一面。經濟合作，中日之間相互依存，特別是近年來由於日本經濟停滯，中國經濟開始更多地影響日本，也促使日本重新思考對華政策。日本往往將亞洲作為一個與美、歐、日並列的經濟圈，在這裡中國也許佔據最重要的位置。中日經濟今後更多的是利益協調，也可能做到相互之間的協調。在政治、外交、安全保障領域，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中日關係存在對抗、甚至嚴重對抗的另一面，這種對抗將影響亞洲兩大國經濟的更深層次的合作，無法迴避，也不能簡單地用“中日世代友好”模糊了國家戰略思維。

日本的百年憲政史，歐式的法制民主演變成東方的“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在憲政外衣之下演出一部戰爭崛起的歷史劇，留下的遺產之一是美國對東亞的控制。二戰之後，美國解除了日本的武裝，用當代右翼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的話說，“閹割了日本，讓日本成了太監”。這種國家情結，構成了日本國家性格的一部分，

又和日本傳統互成表裡。不管美國和日本如何信誓旦旦，美日同盟如何“全球化”，美國式的“一根筋”和日本的表裡不一，如何走到永遠？日本決不會馬上脫離“親美”路線，但這又絕不意味著它有一天反美；日本決不會現在就“親中”，但也決不會排除有一天變成“親中”。日本國內市場相對狹小，人口不斷減少，成長中的中國和亞洲再次成為日本的“生命線”，殖民“滿洲”已經不可能，但如果日本與中國結盟呢？石原莞爾針對英美的“最終戰爭”，可能以另外一種方式實現，美國控制東亞的歷史將會終結。不論繼續“親美”還是回歸亞洲，“改憲”都是戰略性的一步棋。日本敢冒當“跳樑小丑”的危險，同時面對美國和中國，目的在於戰略主動，進退有據。“改憲”之後，日本不單可以合法地強軍備戰，還可以與美國討價還價，甚至迫使美國同意修改《美日安保條約》，增加有利於日本強軍的新內容。

因為美國在東亞的“存在”，中國與日本倒真是利益攸關。日本沒有恢復“帝國”的想法，中國也難以“稱霸”，符合美國的利益，即分而治之。這個美國的東亞戰略，實施了一百年之久，絕對成功，至今未變。當年 9.18 事件發生時，美國不是裝聾作啞，就是暗中支持，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因為有抑制蘇聯和共產主義擴張的含義，符合美國利益，直到“珍珠港”，美國才改變立場，轉而支持中國的抗戰救亡。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絕大的失敗，於是才有對日本的改造，繼續其分而治之的戰略。日本不能成為“普通國家”，除了戰敗國、和平憲法的因素之外，更有美國長期的戰略考慮：絕不能讓日本在亞洲重新做大。那麼，為何美國現在對日本“改憲”持支持態度？第一、美國對於自己軍事上的優勢地位絕對自信，至少在相當一個歷史時期，日本的“強軍”威脅不到美國的安全。第二、60 年的和平憲法和美日同盟，使美國相信日本是可靠的盟友。第三、中國國力的增長，歐盟的勢力增大，中東、東歐問題以及俄國的再興，使得美國在全球範圍內顧此失彼，

日本“改憲”強軍，可以為美國全球戰略服務，特別是在遠東牽制中國和俄國。為此，犧牲部分在日本的基地，應該是合算的，美國可以鞏固“第二島鏈”，讓日本站到第一線，充當與中國對抗的基本力量。

美國不會放棄“改造”中國的努力，只是這 30 年美國認識到“改造”中國遠比“改造”島國日本要難得多。“戰略夥伴”也好，“利益攸關方”也好，背後都有某種“或許可以”教導中國加入美國體系的假定。中國越是若即若離，日本對美國的戰略意義越大，反之，中國越接近美國，日本相對地位下降，日本的離心力越強，美國依然在兩面作戰，相互牽制。冷戰時代，主要是美蘇之間的對立，海峽兩岸、朝鮮半島、南北越南，構成冷戰在亞洲的投影。後冷戰時代，則有“亞洲冷戰未終結”的論調，衍生出一系列圍堵中國的戰略。臺灣問題、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東海資源開發，都在繼續著某種冷戰思維，同時成為調動日本和中國對抗的棋子。臺灣在軍售上依賴美國，地緣和歷史上則有親日傾向，美日都想利用臺灣作為制衡中國的一個障礙。關於美國對中國和亞洲的政策，費正清分析說，“從歷史背景來看，我們不願讓一個敵對的強國主宰東亞，不管它是 40 年代軍國主義日本，還是冷戰時代所謂鐵板一塊的國際共產主義。這種情緒也是 19 世紀英國情緒的回音，當時它作為海上貿易強國，反對俄國鉅人在歐洲大陸的擴張，……奇怪的是，事實證明，毛澤東領導的人民共和國並不是擴張成性的。它把部隊從朝鮮撤走，容忍國民黨在金門設置的前線，在 1962 年與印度作戰只是為了維護邊界的權利。也可能是我們並不真正理解我們同什麼樣的對手打交道？”

日本從進入所謂“文明國家”的那個時代起，就在國民中建立了中華帝國腐敗落伍的形象。明治時代的日本士人，對於這個偉大帝國的衰落，多少有一點感傷，同時避免和中國一樣被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命運。經過產業和軍事的近代化，昭和時代的日本人則

開始輕視中國，甚至於蔑視了。“脫亞入歐論”，從文明層面上否定了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西方文明包括“憲政”成為唯一選擇，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正是穿著“文明外衣”，行侵伐霸道的強盜。新中國成立之後，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真正開始了“民族國家”的建設，和明治維新相似的首先是國家統一，將外國帝國主義勢力趕出中國。作為近鄰的日本人，無論在意識形態上是否接受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再也無法輕視中國。儘管中國還是一個窮國弱國，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革命家，不畏強權，對美國和前蘇聯的霸權主義，表達了確切無誤的譴責和抵抗，得到被美國“改造”的日本人的共鳴。因此，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中日關係都處於合作與友好的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國力的增強，日本的“中國觀”和中國的“日本觀”都發生了鉅大變化。對中國人來說，60年前那場戰爭的恥辱，越遠卻越鮮明，對“小鬼子”的敵視、仇視和蔑視，激發著再打一仗的衝動。反之，日本人在抓住“中國機會”的同時，也忘不了“中國威脅”。每個兩國間的問題，很容易發展為公衆事件，比如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中國的“毒餃子”事件、釣魚島問題；而且一旦發生爭執，很容易激起兩國激烈對抗的公衆意識。這也就是近來年兩國的輿論調查，結果相似，都是互相不喜歡的原因。

2010年，也就是明年，日本國民投票“改憲”。如果沒有意外，“改憲”法案應當可以被通過。如上所述，“改憲”的戰略目標十分複雜，即可以強化美日同盟為目標，也可以建立與依賴中國及亞洲經濟相適應的安全體系，與中國、亞洲各國作“安保合作”，還可以一石兩鳥，二者兼備。經過一個過渡期，繼續加強日本獨自的軍事實力，是日本的固本之策。“改憲”之後，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值得繼續關注。尤其是需要關注美日之間軍隊的合作與可能發生的摩擦，尋找破解美日軍事同盟的契機，現在就說“聯日抗美”時機尚早。“改憲”之後，日本及其軍

隊可能會更積極地介入朝鮮半島事務，介入東海特別是釣魚島爭端，以及臺海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日軍和中國海空軍將可能發生“突發事件”，以試探中國“和平發展”的底線，對此，中國必須高度警惕，決不姑息。對於日本這樣常常“表裡不一”的國家，只有如此。該對抗而不對抗，反被對方視為軟弱；相反，決不退讓的抗爭，最終中日之間或可達成協調。

國際環境，一家獨霸，春秋戰國。日本“改憲”，回歸 19 世紀“普通國家”，富國強軍。日本歷史，少有斷裂，多有連續，百年未變。突發的金融危機，發源美歐，波及全球，一家獨霸動搖，而新生力量尚無“各領風騷數百年”的準備。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只有堅固國本，知己知彼，精煉國策，沉著應對。無論如何，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與美國，日本之間的戰略博弈無法避免，除了經濟合作，與日本的政治、外交、軍事戰略對話值得重視，至少應該提高到接近於中美戰略對話的層次，以建立與美國、日本“等距離”的戰略平衡。